

眼前一张旧时的船票：“宁波—上海”，票价3.60元，当是想起几十年前乘宁波轮船的往事。3.60元是最低票价，五等散席。十六铺码头上上了船，到下水舱，有一条条小凳子铺着，抢个位置，去领一条毯子过夜，“一席之地”在五等散席找到了注解。虽然有蟑螂，有怪味道，有轮机噪音，但是便宜，和10.30元的三等舱同样是夜快开船，到宁波天还没亮。

如果要找一个乡愁的道具，上海的老宁波，很可能相中的是宁波轮船，乃至这一张船票。说来也有意思，明明是往返于上海和宁波，但是老宁波习惯称这条航线为宁波轮船，而不是上海轮船。那时没有高速，火车很慢还绕路，轮船是必选。余光中那一句“乡愁是一张小小的船票”，好像是写给上海老宁波的。至少有六七十年，上海人去宁波，凭的就是一张小小的船票。

看到的这张旧船票，有十个人被它“裹挟”着。当然，船票是模拟的，是沈轶伦《说宁波话的上海人》一书的乡愁设计，要翻开书，先要撕下船票，像上船要检票一样。



晚上八点，夜色笼罩了整个小村。小村的路灯一盏盏亮着，大小不一的窗户透着幽暗的灯光。小村静谧，村南水库里的青蛙有气无力地叫着。

在老家，我躺在老屋客厅的小床上，在微弱的灯光下，读李一明的著作《在路上》。八点半，娘在卧室里用微弱的声音叫着我的小名喊我：“睡觉吧！睡觉啊！”

我听到娘的喊声，答应着，迅速把《在路上》收起来，放在窗台上，起身下床，掀起卧室的门帘，走到炕边，脱鞋上炕，铺好被褥，在娘的身边躺下。爹拉灭电灯，我们躺在黑暗中。

爹60岁以后，把耕种了几十年的土地给了弟弟，开启了“日落而息，日出而不作”的悠闲生活。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太阳落到村西的那片树林底下，爹和娘就上炕了。

多年来，我已经养成了夜里读书写作的习惯，十一点左右才睡觉。现在八点半就躺下，睡不着。但娘身体不好，喊我睡觉，我能不听娘的话？我只有乖乖地挨着娘躺下。

我睡不着。不得不想这里，想那里。两年半前，母亲做了一次手术，出院后，身体渐渐恢复，能吃饭，能睡觉，一度无恙。今年春节过后，娘的身体不好起来，不爱吃东西，一天不如一天。我们带她去医院复查，医生看了片子，也没有回天之术了。无奈，打了几天吊瓶，我们和娘回了家。二月二十二，娘生日那天，又不幸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，身体再一次被摧残，她有些支撑不住。亲人们、街坊邻居们听说后，陆续来家里看望，惊动了大半个庄。娘时常常对来看望她的亲人们、街坊邻居们说，我不行了，活不了几天了，吃不下一点东西。她抓着亲人和街坊邻居们的手，一边说，一边哭，惹得看望她的人陪着流眼泪。娘人缘好，虽然自己不种庄稼了，但农忙的时候，娘会

除了我，书中记录的其他九人都是非常了得，多有宁波人的传奇。有外交官顾维钧的妻子严幼韵，有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，有《愚园路》作者徐锦江，还有陈逸飞、陈爱君……作者亦有宁波的血脉，还请了宁波人毛尖教授写序，闻得到宁波味道了。毛尖教授称，十个人就是十座浮桥，他们在时间的河流里，接通了宁波和上海，和世界。

我只因祖籍宁波，恰好受访于沈轶伦，得以入列。我算不上浮桥，出生时，已经是上海户籍。我爷爷是我们这一支马氏的浮桥，接通了在上海的营生。我是在这座浮桥上来来去去的“民主三号”（轮船船名）没有，但是宁波轮船泊在心里。

爷爷一辈，只会说宁波话；父母一辈，上海话里有很重的宁波口音；我们这一代，被现在的上海话同化了，或许有个别词语带宁波口音，但是会讲宁波话的人很少了。

我算是会讲宁波话的，而且胆子大，到了宁波，喜欢和宁波人对讲宁波话，我的宁波话也温故而知新。

在宁波，未必有机会讲宁波话。某次问路，我已经习惯用普通话，回应我是带方言的普通话，是一个外地人在问一个外乡人。几乎失望时，听到了有路人在讲宁波话。宁波人知书达理，但是喉咙

帮着街坊邻居们捧花生、掰棉花桃等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营生。娘善于助人为乐，她的所作所为，街坊邻居们一桩桩、一件件都铭记在心。她生病了，大半个庄的人来看望她。看望她的人走了以后，她自言自语地说，我这是快死了，要不怎么都来看我。我们说，谁还没有个生病长灾。

我离开娘家去县城工作，一晃也快30年了。刚刚进城的那些年，还年轻，一心扑在工作上，回家并不经常。慢慢地，年龄大了，工作也轻松了，回家的次数多起来，由两三个月回家一趟，到一个月回家一趟，再到半个月回家一趟。现在差不多每周回家，甚至一周回家两次。

以往，过年的时候，我们才睡在老家的炕上。炕头上躺着爹，接下来是娘、我、妻子。平日里回家就是吃个饭，跟爹和娘说说话，很少在家里住下。

那些年，躺在爹和娘的炕上，有意似的和娘说一些往事，比如问娘，我姥爷是哪一年没的？我姥娘去世几年了？等等，东扯葫芦西扯瓢的，娘有些能回忆起来，有些回忆不起来。现在娘病重，也不敢谈这些话题了，大多顺着娘说。她说话，我们说话，她不说，我们不说，她说啥，我们说啥。一旦话题与死沾边了，我们会马上引导娘岔开，说另外的话题。

俗话说，老小孩，老小孩，老了就像小孩。娘八十多岁了，老了，就像小孩了，她需要呵护、陪伴。如果我们不在她的身边，她会无助、胆怯、恐惧。就像我们小时候一样。

以往回家，我多是和爹一边喝茶，一边说话，说说村里的往事和最近发生的趣事。现在，娘躺在炕上，我已经以娘为中心了。我或坐在炕边的椅子上，或躺在炕上，读书、看手机、闭目假寐，让母亲一睁开眼睛，就能看到我。

居一地，时久长，以为是熟悉了风土，但倘若做了导游，领客人去实地探访，面对似曾相识的风景，却常常语塞。想来，或是城市更新的速度远远超越自己想象，但更多还是伴岁月流逝，心有旁骛，渐渐疏离了身边熟悉的景物，这才有了“屡陷‘灯下黑’”的窘境。

日前，得友馈赠赠券，一看地址，西藏北路桥附近，正与多年前供职的杂志社旧址毗邻，不觉心有所动。旧单位虽地处闹市中心，离开后，因新的工作、生活圈与之不交集，很少经过。城市虽大，常人活动的圈子却很小，往往局限在自己生活和工作的区域，如果没有今次机缘凑巧，想来也勾不起去旧地走走看看的念头。

心里挂着事，光影迷离的展会走马观花，并没有留下多少流连的目光。出展馆，沿着西藏北路向南走去，记忆里的旧印象却如相片般一帧帧闪进了出来。苏州河、西藏路桥、四行仓库……往日熟悉的场景和眼见的并不匹配。昔日腥臭乌黑的苏州河变得清亮了，沿河休闲步道边一排排绿植芳菲正艳，随风飘来淡淡的草木香；西藏路桥扩建后宽阔了很多，车流川行，青白的桥面隐约还能看到些旧时的影子。早先杂志社所在的四行仓库已面貌迥异，鼎盛一时的春申江家具城早已搬离，紧贴财政证券公司大东门外的沿街外楼梯也不见了踪迹，复原了红砖灰墙的旧貌。四行仓库部分作为抗战历史纪念馆，向观众展示近一个世纪前那段浩气长存的悲壮历史。昔日工作的杂志社旧址没在一间间创意工坊之间，成为百联创业

“咣咣响”，也是出了名的。我上前用宁波话问。宁波话回过来了：“刮及嘎走去”。用上海话翻译，笔直地走去，但是错了，宁波人不讲笔直，是讲骨直——像骨头一样的直。

我喜欢宁波话的市井气息。形容分量轻，叫做屁轻——像屁一样的无足轻重。形容硬，是贼硬——贼怎么可能硬？是和贼同音的石，石硬，更加硬的是石骨硬，最硬的是石骨铁硬。

今年春天去东钱湖的韩岭村。韩岭村有“宁波十大历史文化古村”之誉。虽然如今是旅游热点了，还住着一千多户本地居民。一千年前是村，现在仍旧是村。

走进一家小饭店，是宁波人夫妻老婆店。在宁波人开的饭店里，吃的是宁波人做的宁波饭，听的是宁波话，讲的还是宁波话——既是正本清源，更加是美食的复合体验，竟然像朱自清《荷塘月色》中的通感：“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；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，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。”

出了饭店向村里纵深走去，有一家家时尚小店，也看得到民居。有几个妇人在自家门外晒笋干。是极嫩的毛笋，切得一片一片，很薄，雪白，宁波人叫

作“玉兰片”。上海是买不到的。问妇人怎么买。妇人回答，不卖，自家吃。没有买到玉兰片，却是感受到了宁波“土著”的怡然自得。

每次旅游，总是会去当地的小镇美食集市，摊位上夹杂了各地方言，做着的是这个小镇的家乡口味，做出来的也不知是谁的家乡。我不相信宁波人可以做好冰糖葫芦，我也不相信西北人可以做好宁波猪油汤团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一方口味养一方厨师。

也只有空气里布满了宁波味道时，有宁波下饭，有宁波话，有宁波习俗，我回到了宁波，心里有一张宁波轮船的船票。

园区的一部分。曾经时髦的铝合金移窗恢复成一扇扇复古的铁窗，旧时痕迹已荡然无存，感觉新鲜而又陌生。倒是工坊里那些埋头电脑前做着设计、策划，握着手机和客户耐心沟通的年轻人，依稀相似昔日杂志社里那些忙碌的身影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我刚从学校毕业，踏上职场。没有移动电话、没有微信、没有电

商平台……联系问候靠固定电话、写信、电子邮件，买个纸笔可以在沿街的小店铺里逛上半天。其时，正是中国经济提速发展阶段，城市经济活跃度不断跃升，新市场、新业态层出不穷，对跑经济条线的媒体人来说，如鱼得水。那些年，城市轨道交通还刚刚起步，去一趟郊区租箱，坐市郊长途班车要两个多小时。春天里，车窗油菜花的金黄扑面而来，眼前竟闪现出小时候学校组织郊游的光景，

只是到了目的地，赶紧采访，约稿，所有的计划得在下午四五点前完成，赶上末班车回市区。那个时候，生活的节奏是慢的，工作的节奏却是快的。

彼时，隔着一座西藏路桥，南北风景各异，往北是鳞次栉比的旧工房，往南不多远则是霓虹灿烂的南京路。七八年间，还是看到了变化。西藏路桥庞巨大的煤气包拆除

了，桥两端冒出了稳得福烤鸭店、久久隆自助餐、必胜客、大食堂……传统的、流行的、时尚的，若春雨润物无声，引领餐饮风尚的各类餐馆一间间地冒出来。美味最能撩动人的消费欲望，大学同学胡兄、张兄都喜文字，又好美食，趣味相投，便有了美食三人组，尝遍申城美食是当时的念想。轮着晚上值班，便约了胡兄、张兄来，在清冷的大办公室里帮忙书写百多个杂志邮寄信封，之后便去单位周边觅美食。尝过稳得福的脆皮烤鸭，去过北京的胡兄直言比北京烤鸭来得入味，酱汁更合本地口味。美味多食，也有失手的时候，那一回是跌在39元畅吃的自助火锅上。冰鲜的螃蟹、条虾，五六种肉丸、鱼丸，十多样蔬菜、水果，如同今日稀松平常的街边小食在当年却是惊艳的呈现。几十个混合着各种调料的丸子下肚，已经是大半饱，但总想着物有所值，螃蟹和条虾便成了捞回成本的主打菜，张兄端着十多多个螃蟹，一大盆冻虾，未曾想久冻的虾蟹味同嚼蜡，食之无味，弃之又不妥，无奈之下将蟹蟹一股脑倒入锅中，浓稠的汤汁掩饰了尴尬，

只是经历过这一回，很长一段时间，让我等对以营销博眼球的所谓美食有了警惕性。彼时春衫少年郎，笑看风华不知愁。想着，这么多年来忙碌于日常，却又常常忽略了日常。经年之后，偶遇睽违的时光，记忆的碎片重新拾起，初入职场的青涩、对新事物的热衷、乃至美味的诱惑……哪一样不令人怦然心动。

抱琴看鹤去，枕石待云归。

昌硕、齐白石都爱画枇杷。在画家的应景题材“岁朝清供图”里，枇杷是主角之一。

荔枝，也是妙品。觉得自己幸运地生活在交通便捷的时代，没有杨贵妃的地位，也能吃上新鲜荔枝。不过，小时候在合肥没见过带壳的荔枝，只见过糖水罐头里的荔枝白肉，记得荔枝罐头比橘子罐头、菠萝罐头、雪梨罐头要贵很多。台湾“吴宝春”将荔枝干放

初夏时节，天气舒服，不冷不热，即使老天爷偶尔使个性子，热它一两天，但一到夜晚还得盖个薄被子。白天的热，不过是给女孩子们试穿裙子的机会。

一入夏，桃花、梨花早不见踪影，海棠、牡丹也谢了。宋代邵雍有诗句“尚留芍药殿春风”，芍药开在春末，芍药一落，春天也就过去了，所谓：“枝上浑无一点春，半随流水半随尘。”没关系，没有了招展的花枝，瓜果蔬菜立即补上。初夏是水果旺季：草莓、荔枝、杏子、枇杷、杨梅、樱桃、香瓜、西瓜，一个个闪亮登场。水果是最方便的食物，洗洗削了皮或去了壳就能吃，不需动火冒烟。

有一年五月下旬，我去徽州三潭摘过枇杷，念念不忘。边摘边吃，那天吃了总有一百粒吧。三潭，是指歙县境内新安江沿岸的漳潭、绵潭和瀹潭三个自然村。群山环抱着三个大面积的深水潭，三潭因此得名。此地冬暖夏凉，终年云雾缭绕。“三潭”特有的小气候，为枇杷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。三潭枇杷，形如丸，体积小，最大的也不过乒乓球大小。但味醇，九分甜一分酸，这一分酸更凸显了九分甜。

苏州“东山枇杷，西山杨梅”，我经常弄反了，其实一样的，东山西山都产枇杷和杨梅，都好。水果和人一样，也讲个“格”，南洋的榴槿虽贵为水果之王，但论格，就不如枇杷了。金农、虚谷、任伯年、吴

抱琴看鹤去，枕石待云归。



张为民

抱琴看鹤去 枕石待云归
(书法) 毛节民

抱琴看鹤去 枕石待云归

抱琴看鹤去 枕石待云归